

《北海文史》第25辑

合浦汉代文物谈

韩潮初◎著

北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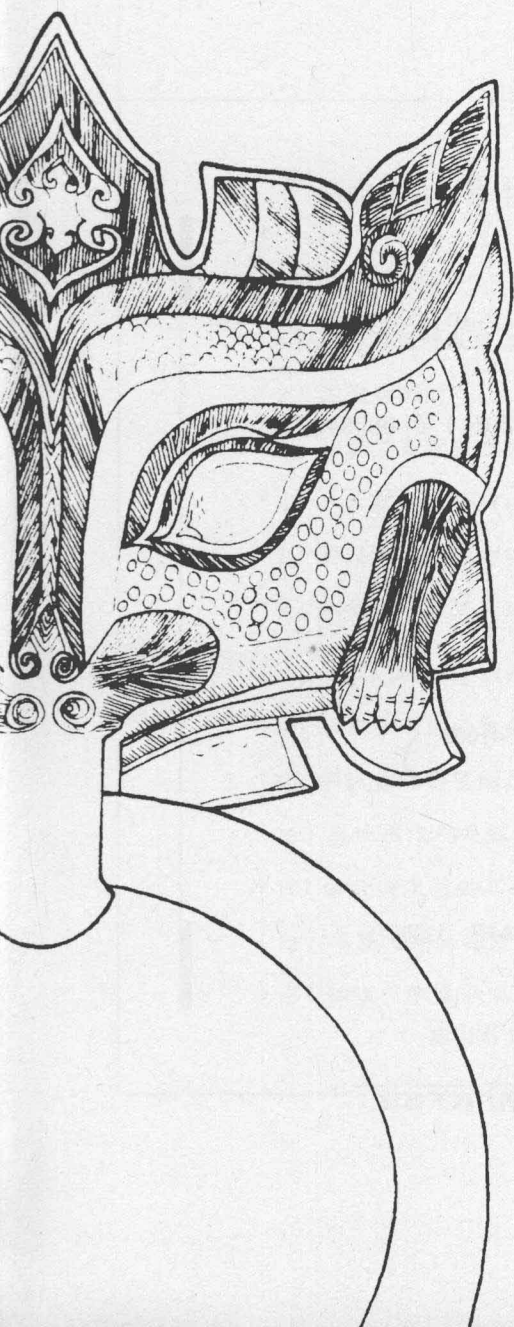


《北海文史》第25辑

合浦汉代文物谈

韩潮初◎著

北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浦汉代文物谈 / 韩湖初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95-0509-8

I. 合… II. 韩… III. 文物—合浦县—汉代
IV. K87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084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55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6 500 册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序1

绪言3

(1) 合浦汉墓群及其意义18

(2) 国宝铜凤灯23

(3) 话说华夏龙纹图腾和青铜器从神坛走向人间30

(4) 从北京奥运奖牌谈到黄泥岗汉墓玉璧37

(5) 黄泥岗汉墓铜仓四壁图纹意蕴试探42

(6) 铜鼎——夏商周奴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46

(7) 从风门岭汉墓铜鼎的鱼、鸟骨骼残骸说到远古的鱼鸟崇拜51

(8) 从合浦汉墓的鱼鸟崇拜遗迹说到远古的人面鱼纹月相历法57

(9) 铜铺首的饕餮纹及其意蕴62

(10) 反映周代刖足奴隶承盘生活场面的三足铜盘69

(11) 由合浦汉墓的三足器说到远古华夏的“鼎鬲文化”73

(12) 华夏文明的曙光和合浦汉墓的饮食祭祀器79

(13) 铜镜、铜盘四鸟(兽)纹的意蕴92

(14)	日光铜镜八角星图纹的意蕴	98
(15)	金饼和金佩饰及玛瑙、琥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之一	105
(16)	陶俑和磨锄铜俑——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之二	112
(17)	熏炉——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之三	120
(18)	玻璃器——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之四	126
(19)	珍贵文物龟形玻璃器和乌龟的文化意蕴	130
(20)	从“劳邑执封”印说到“涂闻令印”	135
(21)	猪形玉握和葬玉	140
(22)	风门岭汉墓——合浦汉墓“博物馆”	148
(23)	从合浦汉墓看汉代的墓制演变	154
(24)	铜牛和蚩尤的传说	158
(25)	由合浦汉墓的铜马说到马文化及铜奔马的朝代问题	166
(26)	铜狗和狗驹马的传说	176
(27)	铜青蛙和青蛙崇拜	183
(28)	神鹿的来由	189
(29)	从铜樽盖的三羊纽说到羊图腾和“三羊开泰”	195
(30)	具有岭南特色的陶屋和铜屋	204
(31)	铜仓和陶仓	210
(32)	陶井和铜井	216
(33)	陶灶和铜灶	222
(34)	铜鼓和合浦“铜鼓塘”传说	228
(35)	全国罕见大型汉窑群遗址	233
	附录一：合浦山口镇北极庙（殿）及其文化意蕴	236
	附录二：两汉时期合浦一直是郡治所在——读《后汉书·郡国志》序	249
	注释	254
	后记	258



序

◎ 车延风



南珠古郡，山川辉媚，人文荟萃，历经千年而依然光华动人。合浦籍学者韩湖初教授《合浦汉代文物谈》一书付梓，为我们打开了一轴辉煌灿烂的文物画卷，勾勒了一道积淀深厚、雄阔绵长的文化图景。

韩湖初教授虽在外治学多年，但故土之情难忘，对乡梓文化事业发展常怀拳拳之心。十年来，在合浦文物研究领域探微镜理，孜孜以求，多有建树。《合浦汉代文物谈》即为韩教授多年心血之作，北海政协能与教授合作光大北海文史事业、丰富北海文史库藏，善莫大焉，幸莫大焉！

合浦汉墓是合浦古代文明繁荣灿烂的历史明证。其丰富而精美的出土文物，不仅具有昂贵的物质价值，更具有难以估量的精神价值。书中以严谨而科学的态度，论证“合浦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的高度繁荣”，展示大汉中华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雍容与自信，追溯南珠文明与中原文明的文化血缘。从瑰丽多姿的金饼、金佩饰、玻璃、玛瑙、琥珀，到精致华丽的铜风灯、龙首铜甬、铜车马、铜扁壶……一道道文化脉络清晰可辨。合浦文化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化体系。两千

多年前，人类文明就在这里交流、融合、激荡。有学者指出：北部湾沿海地区是汉帝国对外贸易交通枢纽，而雄踞北部湾北部沿海中心的北海古郡，早早就因特殊的港口地位而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海外文明在这里“登岸入室”，摇曳生姿；中原文明随着大国商人自信的脚步，从黄土高原走向海洋，一展帝国的骄傲与繁盛；而颇具特色的岭南文化在两大文明的激荡下，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散发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文化的富集带来的是精神的富集。开放、文明的种子悄悄植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形成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自强不息、内蕴深厚的文化特质，打造了开放、包容、吸纳、学习、进取、创新的精神品格。

解读历史，观赏文物，不为炫耀祖先的荣光，而为寻找血脉之源、文化之根，守望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当历史的年轮为新一轮的生长周期蓄势待发时，我们需要一种坚强的力量引领前行。共同的文化认同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带领我们攻坚克难，走向辉煌。触摸着历史粗糙的肌理，聆听着远古的文化呼唤，心中会油然而生一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祖先在我们血脉中植入的文化印记会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浪潮中扬帆起航，实现跨越。

今日的北部湾正风生水起、热潮涌动，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大开发、大发展、大跨越的时机已经来临，文明、合作、友好、交流的航船即将从这里起航，传承文化之根，把握文化之源，可以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更加从容自信地走向未来，在北部湾再架一道新的中外文化交流彩虹。

文化因多元而精彩，人类因交流而美好。我们相信，有着进取创新激情、开放包容精神的北海人，在国家开放开发北部湾新政策的引领下，定能为人类社会合作交流、和谐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绪 言



合浦汉代文物主要是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合浦县城附近有目前所见全国最大的汉墓群。据合浦博物馆介绍：现有封土堆并作了标号的汉墓为1056座，如包括隐蔽于地下的以1:8计算，则有近万座。至今已发掘近千座，出土文物逾万件。不但种类多样，而且工艺精致，华美瑰丽。它们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是西汉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两汉时期合浦繁荣昌盛的见证，具有重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一、合浦汉墓文物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和两汉时期合浦繁荣昌盛的见证

合浦汉墓有一点令人注目：西汉后期起随葬品丰富，大、中型墓葬如风门岭有三座，各出土器物100多件（组）以上，其中不但不乏大量精美珍贵的青铜器、玉器，而且有琉璃、水晶、玛瑙、琥珀、黄金串饰。琉璃珠往往一座就有几百、数千，其丰富程度超过广州汉墓。这反映出“合浦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的高度繁荣”^{[1]-132}，是汉武

帝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昌盛的见证。

我们知道，汉武帝平定岭南南越国叛乱后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原长安入沔水，跨过洞庭湖，溯湘江，越灵渠，沿桂江转浔江，入北流江过桂（鬼）门关分水坳，便可由南流江南下从北部湾北部沿海中心港口合浦出海；然后再沿北部湾西海岸南下抵达东南亚和南亚，与通往西亚、非洲和欧洲的航线相接。由此构成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与北方陆路“丝绸之路”遥相呼应。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关于汉时岭南人口的统计：交趾郡为92440户、746237口（人口），九真郡35743户、166031口，分别位居岭南诸郡第一、第二；苍梧郡24379户、146160口，位居第三；南海郡19613户、94253口，位居第四；合浦郡15389户、78985口，位居第五；其后分别是郁林、日南两郡。其中交趾郡人口数竟约为南海（广州）郡的8倍，九真郡的户数和口数也比南海郡多近1倍（二者的面积均远不及南海郡）。这显然是由于两郡位于当时汉帝国海外贸易的枢纽北部湾和由合浦通往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沿岸之故。苍梧郡是当时汉置岭南交趾部（相当现在省级监察机构）的首府广信所在。秦汉时中央政府开发岭南的两条主要路线分别是灵渠—桂江和潇水—贺江，分别经梧州和封开由西向东进入珠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而苍梧郡所在西江地区是其必经腹地和枢纽，又是海上“丝绸之路”北上长江流域和中原的纽带，故其当年繁荣超过南海（广州）。合浦郡人口虽不及南海郡，但它位于当时汉帝国海外贸易的枢纽北部湾的北部沿海中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和汉代最重要的始发港^[2]。故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金饼、金佩饰、玻璃、玛瑙、琥珀等，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合浦繁荣昌盛的见证。

合浦望牛岭1号西汉墓出土金饼两枚：一枚直径6.3厘米、重249克，刻一“大”字（其下方细刻“太史”二字）；一枚直径6.5厘米、重247克，刻一“阮”字（其上方细刻一“位”字）^{[2]-204}。广西贵港罗泊湾2号汉墓亦出土同类金饼一枚，直径5.5厘米，重239克，



刻有铭文“一××川”。三枚金饼均为圆饼形，正面凹陷。根据蒋廷瑜的研究：所刻“大”、“阮”应是物主姓氏，“一××川”应是数字编码。其规格与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金饼相近，也接近汉代标准重量一斤，与文献记载汉代规定“一黄金一斤”相符。黄金既象征地位和财富，也是国际大宗贸易的货币。《汉书·食货志》云：“黄金一值万钱。”上述三枚金饼，应是当时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蒋廷瑜、彭书琳：《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3]-108}。合浦汉墓出土大量金佩饰，计有：串珠50粒、花球29粒、戒指12枚、环形手镯、耳珥（用金箔制成）各2件、龙首金带钩1件（长6.6厘米、最宽处0.9厘米，重55克）。金串珠以橄榄形居多，也有算珠形、吊钟形、扁圆形。均长1.0~2.0厘米，直径0.4~0.5厘米；透雕穿孔金花球平面呈六角形，外缘有粘珠，直径0.8~1.3厘米，可谓种类多样，形状各异。有的金串珠镶嵌珠宝，耳珥则用金银箔制成。与此相比，银佩饰、铜佩饰反而不多：银戒指、银手镯各3枚，铜佩饰仅有带钩2件、带扣4件和发笄1件。这些佩饰品，既有原来准备输出、后来转为“内销”而成了当地官僚贵族的随葬品，也有由海外输入。如金花球就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一种金花球泡饰相似：半球形，泡壁极薄，泡里在底口稍下处焊接一根横梁，以供连缀。球面形的泡体上有9组图纹，均用金丝和小珠焊接而成。这与西方的多面金珠的焊接方法相同，而非我国传统工艺，应是舶来品（彭书琳：《合浦汉墓出土的佩饰品》）^{[2]203-204}。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海上“丝绸之路”船队是“赍（jī，带着）黄金、杂缯而往”，“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即带去的是黄金、丝织品，带回的是明珠等物。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玻璃器（古称璧琉璃）、玛瑙、琥珀、水晶等各种珠饰，应是属于《汉书》所说西汉船队带回的“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杨式挺指出：合浦汉墓出土的琥珀、玛瑙、水晶、奇石等，大多数应是海外输入，而且数量巨大，种类形式繁多。如玻璃珠饰，总数超过1万枚，九只岭6号A墓一座就有3869枚，还有3座墓一墓超过千枚。

这在江南地区汉墓中是罕见或未见的（杨式挺：《略论合浦汉墓及其出土文物的特点》）^[21-32]。这些玻璃器，有珠、管、璧、环等佩饰品和杯、盘、碗等饮食器皿。珠饰颜色多种（多为蓝色），形状各异，有算珠形、球形、圆柱形、橄榄形、鱼形、瓜和花篮形等。文昌塔1号汉墓出土的玻璃龟形器（见本书131页图1）、黄泥岗1号汉墓出土的淡蓝色玻璃杯（见本书127页图1）和环城乡堂排3号西汉墓出土的玻璃珠，经测试均属钾硅玻璃系统，不同于我国中原地区的铅钡玻璃系统。又如黄泥岗1号汉墓出土的三色水晶串珠（最大粒长2.5厘米、宽1.5厘米、厚1厘米）和紫色水晶串珠，本地并无出产这些佩饰品的记载，应是由海外输入^[2]（《论文集》彩照18）。又如合浦汉墓出土各类玛瑙佩饰，主要有玛瑙珠、戒指、耳塞和圆雕小动物等。计有各种颜色的穿孔玛瑙珠192枚和颜色相间的缠丝和苔丝玛瑙珠，以及戒指1件、耳塞2件、耳珰5件、狮子6件、鹅5件。又出土琥珀珠50枚、印章5枚（1枚刻有“劳邑执封”为官印，余4枚为私印），以及管饰4件、圆雕狮子和青蛙各1件。琥珀原产欧洲，我国云南虽有出产，但汉晋时期多以为出自西域，或谓大秦多玛瑙。合浦汉墓出土有玛瑙圆雕狮子，而狮子至汉代才传入我国。由此推断这些玛瑙佩饰和琥珀圆雕小动物应是由海外输入，或输入原料进行加工而成。可见汉代我国与海外交流，既有商品的交易，也有输入原料后用我国的传统工艺进行加工使之成为我国的传统用品，如玛瑙戒指、玛瑙耳珰、玛瑙耳塞、琥珀印章等；有的则是引进技术，如玻璃的烧造，就吸收海外技术，由当地工匠利用本地原料生产（同上，彭书琳文）^{[2]-205}。

合浦凸鬼岭20号汉墓出土了罕见的马面形托灯陶俑（见本书168页图2），堂排汉墓出土了宽袖大袍的胡人陶俑（见本书115页图2）。陶俑在广州、贵港、梧州也有出土，均为男女形象，从脸部特征看，应属所谓“胡人”。《三国志·士燮传》载合浦太守士壹为了讨好吴主孙权，“时贡马凡数百匹”，可见马面形有其背景。又载当时交趾太守士燮及其兄弟（分别任合浦、九真和南海三地太守）“威尊无



上”，出入“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胡人”指来自印度、阿拉伯的商人或传教士。有学者指出：广西贵港和梧州汉墓出土的陶人俑，从其发短、深目、高鼻和厚唇来看，“更有可能来自西亚或非洲的东岸”（程存浩：《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始发港》）^{[2]-192}。长沙马王堆墓主西汉轅侯家大量的象牙、犀角、玳瑁、珠玕，应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合浦运载到达长沙的。该墓遗册记载墓主家有“胡人一人”、“胡骑二匹”，可知当时合浦、贵港和长沙等通往海上“丝绸之路”城市都有西方商人来往或居住（傅举有：《从考古资料看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2]-220}。

可见，金饼、金佩饰、玻璃器、玛瑙佩饰、琥珀印章和陶俑等，见证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合浦的繁荣昌盛以及汉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二、合浦汉墓文物的岭南特色

合浦汉墓至今出土文物逾万件。不但种类多样，而且工艺精致，华美瑰丽，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

合浦地处岭南，古为“百越”之地。“百越”主要由我国东南和南方的土著居民发展形成。旧石器时期有广东马坝人和广西柳江人。新石器时期创造了几何印纹陶文化，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自远古便与中原的华夏族有密切交往，商、周时代逐步参与中原王朝的政治活动。秦汉统一中国后加强了对岭南的开发，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文化源源不绝输入，大大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合浦汉墓文物既深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也具有鲜明的岭南地方特色。

先说青铜器。它起源于中原，是夏商周王朝的祭祀礼器，是三代等级制度和文明的象征。早期粗制草创，纹饰简陋，殷商后期进入成熟期，风格显得厚重、沉雄和神秘。其代表饕餮纹，在狰狞而可畏的

神秘中“积淀有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4]-38}，最有历史与审美价值。至周代中、后期形制趋向简便，刻镂肤浅，神秘色彩减退，饕餮纹失去权威，降为附庸。从战国至两汉，由于经历了社会巨变，旧有的宗教观念衰落，人间生活和花鸟鱼虫逐渐成为纹饰的普遍题材，器形由厚重走向轻灵，造型由庄严走向奇巧，手法由象征走向写实，给人亲切和美的享受。青铜器艺术由此获得新生。蒋廷瑜指出：商末周初青铜器传入西江地区后，至汉代，我国南方“兴起了一种镌刻花纹工艺，在薄胎青铜器上用坚硬而精细的金属工具，镌凿镂刻出繁缛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使器皿显得特别精美华丽”。这类青铜器主要集中发现于广西东南部地区，尤以合浦、贵港、梧州三地最多（同上蒋廷瑜、彭书琳文）^{[3]-108}。其中大多为生活用具，造型、图案纹饰不再令人恐惧。如望牛岭1号西汉墓出土的龙首羽纹铜魁、龙柄铜方匣所刻龙首嘴微张开，黄泥岗1号墓铜仓正门所刻饕餮纹及回头张望的猛虎，其神秘色彩已经减退，均不令人生畏。而且器身多镌刻羽毛纹、菱形纹、三角纹，精致华丽。据合浦博物馆介绍：红头岭3号新莽墓出土的龙凤纹铜樽，器身镌刻龙、凤、猪、兔、猴等，还有菱形纹、三角纹、弦纹等，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北插江盐堆1号墓的人足环耳铜樽，其博山顶盖饰凤纽，浮雕12座山峰和12条螭龙，姿态各异，相互呼应，神态生动，并饰以云纹、三角纹等，圆筒形器身镌刻菱形纹、羽毛纹、三角纹、弦纹，纹饰丰富，镂刻精致；北插江24号墓的错金纹饰铜剑，剑身两面饰错金卷草纹，非常精细；文昌塔生资仓1号汉墓的羽纹系链铜扁壶，器身所刻羽毛纹、菱形纹、三角纹，镂工精致，小巧玲珑，等等，均有浓郁的岭南风格，体现了镌刻错金工艺的高超水平。又如望牛岭1号西汉墓的三足铜盘与西周它盘类似，但装饰纹样则完全是岭南风格：盘内细刻四叶二鹿二凤凰纹，从盘沿到盘身缀以菱形纹、三角纹、回纹、锦纹图案，富丽纤巧（见本书70页图1）。望牛岭1号西汉墓的国家一级文物铜凤灯（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1978年版刊有图片）：器身为凤鸟双足并立扭头回

望状，颈部为双层铜管（上下调节高度），背部放置有手柄的灯盘，嘴衔喇叭形灯罩，点燃时烟烬经颈部的铜管导入盛水的腹腔溶解，构造精巧实用，而且符合科学原理，防止空气污染，是两千年前的环保产品，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据合浦博物馆介绍：1978年该灯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会》会标到日本和欧美巡回展出（入选展览的还有同墓出土的铜仓、提梁铜壶、龙首羽纹铜甗）。此外，合浦汉墓的一些陶器，如平田1号墓的陶簋、陶壶、陶提桶、四系陶罐，均制作讲究，戳印羽毛纹、刻画菱形纹、三角纹、弦纹等，也显示出岭南风格。

关于合浦及广西境内汉墓随葬的大量玻璃器，向来有“外来”与“自创”两说。由于出土的汉墓多在合浦、贵港等地，故有学者认为是由西方输入。但果真如此，其数量必然有限，价格定然昂贵，只有富豪权贵才买得起。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贵港罗泊湾和合浦望牛岭两座目前已知的广西最大的汉墓中，前者仅有玻璃珠和玻璃鼻塞各1件，后者仅有玻璃珠436粒。虽然前者曾经被盗，但后者保存完好，说明量少非因被盗。相反，周围的一些中小型平民墓，出土数量不少，如贵港新村4号小墓出土玻璃珠1661粒（黄启善：《广西汉代玻璃与海上丝绸之路》）^{[2]-162}。合浦九只岭并非大型的一座墓出土3869粒（同上彭书琳文）^{[2]-198}，为目前所知广西出土玻璃珠最多的一例。廉州灯泡厂1号墓也出土800多粒。而且，一些中小型墓还出土了玻璃器，如贵港风流岭2号和合浦红头岭11号两座西汉墓各出土玻璃杯两件（同上黄启善文）^{[2]-162}，可见“外来”说难以成立。其实，春秋时期我国已有自制玻璃（如玻璃璧）。各地普遍发现的汉代玻璃器有盘、杯、璧、耳杯、衣片、带钩、印章，“都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点”，这些在西方古玻璃中是“看不到的”（同上黄启善文）^{[2]-160}。当时我国自产玻璃不但能够满足本国的需要，还远销东洋。如日本福岗发现铅钡玻璃，表明早在日本“弥生时代”（约相当于公元一、二世纪的我国秦汉初期）我国与日本就可能进行了玻璃贸易（同上黄启



善文)^{[2]-162}。根据对广西汉墓的17件玻璃器进行测试,这些玻璃分属三个系统:13件属钾硅玻璃、3件属我国古代中原的铅钡玻璃、1件属钾钙玻璃,没有西方的钠钙玻璃。这说明大部分是由我国制造的(同上蒋廷瑜等文)^{[3]-107}。其实,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古玻璃器中有合浦自产的玻璃。晋代葛洪《抱朴子·论仙》载:“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水晶碗即玻璃,交、广即汉时交州、广州岭南一带。这说明晋代以前岭南人已经掌握烧制玻璃的新技术。它应是以“五种灰”(一种自然纯碱或草木灰)作为助熔剂,烧制出一种“含钾量较高而含镁量较低的”的“南海玻璃”(同上蒋廷瑜等文)^{[3]-108}。黄启善先生指出:两广出土的大量玻璃珠饰,经化学成分测试,有部分既与中原的铅钡玻璃不同,也与一般的罗马玻璃不同,含氧化钾高达13.7%。它“可能是当地或东南亚地区用草木灰作助熔剂制作的”(同上黄启善文)^{[2]-160}。经测试分析证实:合浦红头岭11号汉墓的2件蓝色圈底玻璃杯属高钾低镁系统;合浦堂排汉墓的3枚玻璃珠、管,是“由中国本土的矿料制成的,排除了从国外输入的可能”,应是又一种“中国地方特色的早期玻璃”(同上黄启善文)^{[2]-160}。可见,合浦汉墓的玻璃器大部分是我国自己制造,其中特有的高钾低镁玻璃则是岭南人的创造。

合浦汉墓还出土了大量陶屋,又几乎每座墓葬都有粮食储藏器(陶仓或铜仓),且多是干栏式建筑,如风门岭24号墓^{[1]-96}、26号墓^{[1]-53}和母猪岭东汉墓^{[1]-167}均出土有陶仓。风门岭28号墓^{[1]-111}和母猪岭东汉墓^{[1]-167}的陶屋为干栏式两层建筑,上层居人,下层圈畜。这是根据岭南天气潮湿的特点而设计的,具有通风防潮的特点。风门岭24号墓陶仓出土时尚有稻谷碎壳,经鉴定是“未经碳化的”^{[1]-185},应是与陶仓的通风防潮作用有关。这些干栏式建筑还讲究规模、装饰。如母猪岭1号墓陶仓为悬山顶干栏式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前有走廊,开门一道,板瓦顶,正脊,上有博古装饰;望牛岭1号墓铜仓为一大间,置于平台之上,以八柱托起,悬山顶,仓房前壁有两扇门,各有门环左

右开启，仓前有走廊，前沿有栏杆，十分讲究；黄泥岗1号墓铜仓也是一大间，仓门及板壁镌刻精致华丽的图案（图见本书43页，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1]-106}。1995年广东省博物馆杨豪在一次学术讲座上发言称：他在印尼泗水、三宝瓏、巴里岛等城市的博物馆展品中看到有汉代粤式铜鼓（以广西铸造的数量最多），一些村寨建筑物大门饰青蛙雕刻，并采取干栏式建筑，这说明汉代岭南居民可能假丝绸之路迁居印尼一带（司徒尚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形成》）^{[3]22-23}，这种干栏式建筑也早已向海外传播。

可见，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它显示了合浦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智慧与才能，是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应予以继承和发扬。

三、合浦汉墓文物根在华夏文明

早在石器时期，华夏先民已遍布全国各地。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教授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把我国远古华夏文明分为北方、东方、中原、东南、西南和南方六大文化区^{[5]29-30}，并指出：距今7000至5000年源于华山脚下的中原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北方区红山文化在辽西“碰撞”，“实现了花（华）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文化结合，并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区和东南区）文化“再次结合”，并于距今5000至4000年产生了“陶寺文化”。与此同时，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文化面貌发生了大规模、幅度空前的变化；以西北古文化为一方，以东南古文化为另一方，这两支古文化在更大范围实现“组合与重组”。这就是与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相应的“龙山时代”的文化背景。其后便是夷、夏斗争与相融而形成共同体的夏商周三代，至战国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5]-134}，再至秦汉完成大统一局面。合浦汉墓文物深受自远古至秦汉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根在华夏文明。



关于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笔者认为它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合浦繁荣昌盛的见证，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而根则在远古至秦汉的华夏文明。

先看墓葬形制、随葬文物及其制作。合浦至今尚未发现西汉早期墓葬，中期中仅1座^{[1]-118}，后期17座^{[1]-119}，均为竖穴木槨墓；东汉前期有8座^{[1]-120}，多为砖木合构墓，东汉后期墓较多，有18座，均为砖室墓^{[1]-120}。可见其类型大体与中原一致，但时间稍为延后。礼制和随葬文物亦多源自中原。如青铜礼器鼎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按传统礼制，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风门岭26号墓出土铜鼎4件^{[1]-138}、23号墓3件^{[1]-137}，其余多为1或2件。而26号墓之大仅次于合浦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的望牛岭1号墓，还出土青铜马车；23号墓也有一定规模，且有玛瑙串饰、金箔出土。由铜鼎数量可见大体仍遵中原礼制。文物制作如铜器，无论仿造或独立设计，均明显受到中原的影响。堂排1号墓的三足铜盘作人形蹲踞承盘状，类似西周它盘繁复的演礼片段，即裸身侍者向“尸”（活人所扮演的祖先神灵）跪承盥洗用具的情景，这是中原礼制（奴隶制等级制度）的痕迹（详见本书69页《反映周代刖足奴隶承盘生活场面的三足铜盘》一文）。铜风灯以其环保功能令人赞叹，其实汉代具有同样功能的铜灯不少，如长信宫灯（图见本书28页），宫女左手持灯，烟炷通过右臂的管道纳入腹内水中溶解^{[6]-78}。长信宫乃汉初文帝皇后窦太后的居所，其宫灯应早于合浦的铜风灯。又合浦风门岭26号墓出土的博山炉（图见本书121页）也与陕西兴平市茂陵东侧1号无名冢出土的错金竹节博山炉（图见本书122页）十分相似。后者原为未央宫御用之物，后被汉武帝赏赐给其姐阳信长公主（长公主先嫁开国功臣曹参之后曹寿，后嫁抗击匈奴名将卫青）。可见合浦汉墓的博山炉的设计原理和制作工艺应是由中原传来（参阅本书120页《熏炉》一文）。再如风门岭26号汉墓中完整的鼎、盒、壶、钫礼器组合在中原早些时期的墓葬中较为常见，其中B型铜提梁壶则在河南洛阳战国墓、汲县等地汉墓